



张光芒: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文精神的失落等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学校园。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不需要提倡和讨论文学教育的问题,那时候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地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自然也能够从文学经典汲取思想资源与精神营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往往能够受到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但近些年来,大学生的文学热情在锐减,文学教育遭遇到极大的挑战。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学文学教育的现状的?你如何认识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性?

徐兴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思潮、人文精神失落确实影响了大学的校园文化,但是话说回来,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对文学的虔诚也并非正常的现象。那种对文学的渴望与热恋可谓纯洁而幼稚、真诚而狭隘,只有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80年代的文学阅读还能引发一种类似“启蒙”的热潮,而当时的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已不再担当这样的角色。除了中国当代作品之外,许多当时中国大学生阅读的中外名著都是刚刚解禁的古代和近现代的文学经典,在中文专业的教材与教学中还要适当地加以“批判”,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更是圈锢在“自由化”的禁区,这样的“启蒙”是半开放的、变态的,不断和意识形态的管控发生着冲突,而且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阶层。

应该说,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技术的引进,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化的市场、时尚的文化与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兴起,既中断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启蒙”,也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管控,消除了文学阅读的禁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是一种流行的、群体的、感性的文化,它兴起的同时,也使得精英式的、追求自由和卓越的、个人主义的人文精神失落。世界的性质变了,原先的“真理”似乎也不存在了,文学艺术一下子成了浪子,甚至文学的形式都发生了消解。随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接踵而至,在平板电脑上阅读的数字已不完全是含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而是日常生活的消费品。这种新兴的文化一方面可能是大众的、民主的,一方面可能是浅薄的、流俗的,它造就的人群不断地涌进大学校园,他们当然不能像80年代以精英自居,以使命自负的大学生一样有些迷信地崇拜文学,崇拜伟大的、经典的作品,他们和校园外的大众一样,不是没有热情,但相当一部分是寻求消费品的热情,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即便是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和作品,也仅仅是明星和名牌消费品而已,这就是莫言得奖后文学书籍有了一点销售热度的真正原因。

文学艺术如何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恐怕首先还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要想影响更多的人,就必须成为属于更多人的文学,民主与新的科技与市场相结合,成为大众的、民主的文学,这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但是,要让文学在抒发大众情感、满足大众趣味的时候,又充满理想与诗意,给人们以美的感官享受和精神升华,让人们观照人性的伟大与无奈,就必须通过积极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和文学教育,从而塑造自己的读者群体。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形式源自“说话”这种大众和通俗的艺术,其中不乏泥沙俱下的低俗作品,但在强大的古典抒情文学(诗)与叙事文学(史)的范式引导下,经过几百年的孕育,能够出现“四大名著”这样伟大的作品。现代白话文学运动是由大学里的精英倡导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新文化运动”的理想,所以现代白话文学的社会文化影响远远大于现代白话通俗文学。

教育带有较强的主导性甚至强制性,任何社会文化都对途径有一定的信任,认为教育是成就人生的必由途径。大学文学教育承担了普及文学知识、训练学生的语言文字的表达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格与情操,提高学生的文化阐释与批判能力,传承、塑造和创新人文精神。大学教育也走向了国际化和大众化,逐渐从过去

塑造人文精神 打造民族文化未来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访谈

□张光芒

的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大学的文学教育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因而也承担着更重的责任,不仅对文学的未来,也对大众文化的未来乃至民族文化的未来起到双重的影响。孔子处在礼崩乐坏、贵族阶层衰落的时代,他却将贵族教育体系中最重要《诗》教作为他开办的平民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诗歌传统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

张光芒:在您看来,当前大学文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呢?

徐兴无: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大学的文学教育包括其他一些人文学科存在的最重要问题是“边缘化”。首先体现在中文专业院系规模与配置下降。中文系科是一种办学成本低的专业。因为办学成本低,很多大学,特别是工科大学办的中文系科已流于与文秘、新闻传播、法学等混杂在一起的院系之中,或为了方便招生,或充当公共课程教学。只有大陆的重点大学和台湾的知名大学,特别是有着百年办学传统的大学还能保持中文系科独立、完备的学科建制和相对的学科优势。但这种优势也是相对的,因为评估体制是按照理工科和社会科学的国际标准建立的,这些学科在国际上是同质的,可以统一衡量,但国际上的文学等人文学科多是异质的,无法统一衡量,文学学科不能为大学争取国际公认的学术业绩,因此在资源配置等方面必然受到限制。

“边缘化”其次体现在通修性文学教育萎缩,主要是大学语文课程的撤消与低水平教学。自晚清创办新式高等教育,就没有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也是各个学门通修的课。1942年又创设“大一国文”课程,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余冠英、沈从文、王瑶、陈垣、启功等著名学者都担任过这门课程的教学,这个传统在现在的大陆高校中仍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延续。50年代,大陆高校在苏联教育模式下中断了文学通修课程,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教授等教育家们深感于大学生语文能力的下降和中国文化的断裂,积极倡导开设“大学语文”,80年代在全国高校得到较好的推广,但由于教育部从来没有明确将其规定为本科必修课程,大学语文一直没有在中国高校中获得大学外语教育那样的制度性保证。此外,一些大学里的通识教育中也开设了文学课程,但也是自由选修课程,又多是作品导读与鉴赏类的内容,准人与准出门槛低,往往流于赠学分的课程。在以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绩效为权重的学科评估体系下,中文系科与院系只得重专业课程轻公共课程,一流的教师多不从事这门课的教学,教学水平降低。目前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倡导大学语文的一流大学都不再普遍开设大学语文,但说到底,还是这门课不符合当下功利性的学习观,不能如外语技能那样成为各种晋升途径的敲门砖。

张光芒:您对重视“大学语文”的呼吁,我认为非常及时和必要。这些年从一些其他院校的同行那里了解到,有些高校的确把原本是必修公共课的“大学语文”砍掉了,“大学语文”的受教群体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文学教育被忽视的程度越来越大,这是很不应该的。那么,在您看来,当前的大学文学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哪些原因引起的呢?到底是我们的大学文学教育自身出了问题,还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原因占主导?学生、教师、学生各个方面在其中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徐兴无:大学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一定是紧密相关的,互为因果的。英国教育家托尼·比彻等写过一本《学术部落及其领地》(唐跃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书中指出,在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变成了目标明确的“大众化”,政府、政策宣传和宣传上也越来越强调高等教育的职业培训功能,认为高等教育除了有研究功能外,还具有为专业领域、工业、商业输送合格学生的功能。这就意味着不再强调学生个体性格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不再强调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文化贡献,不再强调非功利性的纯学习观。西方如此,而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喊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因此它的教育目标、取得的成就必将和出现的问题一起和国际高等教育接轨。可以说,当代大学与当代文学一样,皆被全球化和大众化的潮流左右,与培育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向生产国际化的科技与文化知识、培养大众化、国际化的人才转变。大学产品的科技与经济品质在提高,而精神文化品质在下降。我曾经参加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有关大学管理的研讨班,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瞄准国

际一流大学的高效率的办学经验,都可以归结到他们明确提出的大学“企业化运营”的方针之下,但其中缺席的正是有关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和大学人文精神的讨论。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主导的社会中,文学只能是休闲文化的消费品,在现代大学“企业”中,文学教育也只能是一种点缀品。

张光芒:这也就是说,虽然从大的环境到学校,从教师到学生,这些层面都对文学教育的萎缩有一定的责任,但相对而言,应该从下而上承担更多的主动性作用。那么,教育方针体制、学校的措施制度、教师的主导作用、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这些方面如何形成良性互动,才能真正有利于大学文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切实提高大学文学教育的质量,达到良好的效果,应该注意哪些新的问题?有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徐兴无:大学教育带有明确的理想与目的,其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方案是规定性的。大学的文学教育不能成功,首先是制度性的保障。由于中国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与教育制度设计有责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以理工科为主导学科的国内一流大学也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大学具有示范作用,比如南京大学已经提出“办最好的本科”的口号,如果文学教育成为缺失或弱项,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其次是教师的问题。文学教育是一种办学成本极低的教育活动,但是对教师的学术修养和教学水平要求极高。民国时期率先设置“大一国文”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倡导开设“大学语文”的是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些都是国内的一流大学,是有理想的大学。但是“大一国文”在中国坚持了下去,不仅有制度保障,而且有名师的保障。而“大学语文”目前的不景气,不仅没有得到制度的保障,也没有名师的保障。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教授、博导上本科生的课程,说明重科研轻教学已是普遍现象,更何况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本科大学教育呢?这两个保障是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根本问题,既是老问题,也是永远的新问题。

张光芒:最近,接连发生了复旦大学投毒事件、南昌航空大学腐尸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打架致死案,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尽管不能过分扩大化,但至少说明大学教育出现了一些痼疾。有些媒体在反思这几个事件时,习惯援引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话加以评论,钱教授曾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这种评价对于其他的大学生也许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对于投毒事件,对于马加爵等来说,却是离题太远了。后者根本不是那种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反而是毫无理性可言,在他们出事时更谈不上高智商、功利性和精于算计,而是完全扭曲了心智。伴随着这种对待他人生命的冷酷和漠视的行为的,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

不少论者试图从加强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层面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出现,我想这也有点治标不治本。就此而言,恰恰是文学教育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文学里的情感教育、真善美的熏染、同情心的加强、人性的自我呵护等,从精神的根柢处远离那种变态和疯狂。因此,我们对于文学教育自身也应该有重新思考的必要。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思考和建立大学文学教育理念?

徐兴无:这些问题固然不是文学教育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有责任和义务来承担这个问题。我们常说“文学是人性”,相应地,文学教育的第一义是人的教育,何谓人的教育?是以人为目的的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是让人不论为工具的教育,这是重新思考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出发点。很多人都认为大学的文学教育就是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与修辞、说话技能或者对文本的理解能力,这是对大学文学教育的偏见与浅见,大学文学教育固然要承担上述知识与技能目标,但这不是她的理想。儒家开创的传统教育目标则是所谓的“成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说,“君子之学以美其身。”顾炎武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都道出了文学教育和人文、道德教育的本质是对个人的心智与能力的培育。而在儒家看来,最重要的心智当然是“仁爱”之心。其实西方的古典思想中也有这样的认识,《新约》中记载圣保罗的话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

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铍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无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张光芒: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是教学的技术而已。”(《什么是教育》)同样,文学教育也应该首先获得自身的本质。在我看来,文学教育在本质上是创作文本与文学形象为载体,激发读者的审美想象力和主体的自由创造性,通过对历史与人类、他人与自我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观照,有助于形成一种富有终极关怀与超越性的世界观,从而确立起既保持民族精神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个性和独立性。从根本上说,这样的文学教育是“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结合体,它成功的关键不是灌输和教导,而是激励和启示,不是知识的积累和秩序的营造,而是意志的塑造和个性的发展。这种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它的“无用”,但正如许多教育家意识到的,它的“无用之用”正乃“大用”。您认为,大学文学教育如何才能获得它自身的本质?

徐兴无:文学对人性的启发和爱的培育与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的理性教育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只有当个人在审美的愉悦与净化过程中产生出自觉和自愿,道德和信仰具备情感的基础和意志的抉择,它们对人性的感召力才是合理的。孔子将《诗》教列为第一,因为比礼教更为有效。白居易说:“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孔子最早概括出文学教育本质与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是对个人情感和思想的启发,让受教育者自觉到他的“自我”和“本性”;“观”是通过文学了解社会和世界;“群”则是用文学感召人们,所谓“群居相切磋”,使人们以同情和爱心“引譬连类”,推己及人。“怨”是通过文学质疑、批判社会,特别是不合理的政治和非道德的现象。

此外,文学教育不是在课堂上欣赏、导读作品就能完成的,要能培育起学生的文学阅读与写作、创作的兴趣,知道读什么作品,并将文学修养转化为生活情趣与人生理想。做到这一点非常艰难,因为当代大学中像孔子那样能和学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老师太少了,所以,大学应该以有效的政策和方式鼓励优秀的教师从事文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教师实现自我的过程。

张光芒:您这个“实现自我的过程”的观点,让我想起雅斯贝尔斯说过的另一句话:“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颗心灵唤醒另一颗心灵。”通过这一过程,教师的生命理想流淌在学生血液之中。这是对所谓“教书育人、薪火相传”真正本质的深刻理解。

南京大学文学院对于文学教育历来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也十分重视文学教育和素质教育。记得中文系曾经以“中文系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您本人也先后主持或参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有关教学改革等重大课题。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被许多高校作为必修课程教材,有着广泛的认可度和影响。您认为文学院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经验?有哪些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徐兴无:明年,南京大学文学院将迎来她的百周年诞辰,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坚持真理而不追逐时尚的学术精神和朴实、严谨、创新的学风。目前从中国语言文学和由其发展出来的戏剧影视文学和艺术学理论三个一级学科组成。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和文艺学相继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进而整体升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她和很多中国大学的中文系一样,承担着文学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非中文专业文学教育的任务。我个人认为这两类人才的文学教育目标不同而已。就大学本科教学而言,通过完成教学改革项目尝试实践教育理念是大学教育体制的常规做法,文学院在这方面比较自觉,先后在几届系主任和院长的主持下,由许多教学骨干共同参与,完成了多个教育部本科教学改革项目,其中也有如“中文系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中文专业研究型课程体系建构”等获得国

家级教学奖的项目成果,我个人也是参与其中而已。项目、获奖只是相对的肯定,最重要的是你通过这些行为实现什么样的教育理念。顾炎武说的“器识”是一种解释与判断能力,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创造性地解释和批判文化遗产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解释和批判既受到历史条件、客观条件与文本条件的制约,又要冲破这种制约获得自由,创造新的思想。在南大文学院的文学教育以及承担的学校通识课程教学当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比较重视解释,而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学术比较重批判,但都希望自己院系的学生乃至其他院系接受文学教育的学生们无论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事业,都是具有独立批判意识和高度人文精神的人。教学改革项目仅仅是提出一些理念,规划一些可行性而已,最重要的是还是实践。

早在匡亚明老校长提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时,当时的中文系就承担了教材建设和课程教学工作,我个人也承担过大学语文的教学工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南京大学不再将“大学语文”作为全校必修课程,但也十分重视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文学院教师也积极参与其中。就近三年而言,文学院老师为学校各专业开设了一系列通识课程,有27位博士生导师为一年级入校新生开设了27门以经典研读为内容的新生研讨课,位列全校之首。在部分院系的邀请下,一些老师仍在坚持教授“大学语文”课程。文学院在文学教育方面还有一些特别值得介绍的成就,比如我院的莫砺锋教授在百家讲坛讲授有关唐诗和白居易的系列讲座,向大众展示了南京大学知名学者的文学教育水平与人文修养。我们的戏剧文学教育成绩也非常突出,文学院的戏剧影视文学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生教育体系完备,在戏剧实践方面不仅在大学校园中,还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从去年到今年由本科生温方伊创作、由吕效平教授导演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已成为中国话剧艺术的“事件”。今年我们还引进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担任专职教授,从事文学单元,特别是文学创作人才的发现与培养。戏剧演出和文学创作是任何大学的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形式,惟有这种实践性的、课外的文学教育,才能突破现代大学以课程教育为主的文学教育的局限性,达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这一切都说明文学院的老师们对文学教育怀有很强的使命感,因为在目前的大学管理与评估体制下,他们的科研压力巨大,专业教学任务繁重。

2005年,时任系主任的丁帆教授有感于“大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理念改革的必要,邀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朱晓进教授和我共同主编了《新编大学语文》,这本教材有多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但确实率先倡导了一个新的“大学语文”教育形式,即以人文经典为教学单元,组合古今中外的文学与文化经典或名篇,兼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文学艺术等向度的内蕴,突破了过去“大学语文”教材以文体、文学史为脉络的专业教材体系和以道德修养与社会生活为主题的素质教育体系,其目的正是彰显大学文学教育的人文精神,以继承和光大南京大学倡导的“大学语文”教育传统。

张光芒:那么,徐院长,您在主持文学院工作中采取了怎样的具体措施加强文学教育,有着怎样更详细的未来规划?打算如何推进文学教育的改革深入?尤其是有没有具体的打算如何把您自己的教育理念应用于教育实践之中?

徐兴无:我没有任何新颖的文学教育理念,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文学教育规划和打算,更没有能力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我所说的都是一些再浅显不过的老生常谈。三国时的易学家管辂被人指责他讲的道理是“老生常谈”时,他说“常谈者见不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各种相关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向各种人群重复、解说这些“老生常谈”,说服人们认识到这些“常谈”中有着他们忽视“不谈”的问题和价值,从而认可、理解、支持文学教育。教过“大一国文”的朱自清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本《经典常谈》,大学文学教育的内容,其实也是永恒的“经典常谈”,关键在于教师们如何遵循文学教育的规律,提高自身的修养,做到常谈常新。教育是真正的文化实践。

“大学文学教育”访谈

重要的是对第一手史料的解读

□徐洪军

《暗夜中的潜行者——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一种探讨》(梁艳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的贡献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详细完整地“还原”了《今天》(1978—1980)杂志的历史面貌,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们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一些认识。而两个方面成绩的取得都完全建立在作者对第一手历史资料的解读之上。

在文学史上有两个《今天》,一个是存在于1978—1980年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一个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作为这部著作研究对象的《今天》(1978—1980)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问题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就像陈思和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它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轨迹,自成体系,与这三十年的主流文学史若即若离保持着张力。”但是由于缺少《今天》刊物的完整原始资料,相关研究一直停留在人云亦云的阶段而无法深入推进。作者的所有结论基本上都建立在对《今天》完整原始资料充分掌握的基础上。为了

研究的深入准确,作者不仅掌握了近几年披露的相关文学史料,影印了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1997年整理的《今天》(1978—1980)原件,而且还采访了《今天》的相关作家和诗人,接触到了《今天》杂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我们经常说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历史、解释历史,“发现”之所以能够实现,“解释”之所以能够有效,则必须有第一手历史资料作为支撑。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史研究对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显得相对比较薄弱,很多文学史的“结论”基本上还停留在对文学批评的简单借用上。要想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当代文学作家作品有一个更加准确公平的历史定位,就需要依据第一手历史资料“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暗夜中的潜行者》呈现了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从创刊到停刊的完整历史面貌,包括这个刊物是如何筹办起来的,它的具体内容如何,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它在爬梳

考析《今天》所牵涉的复杂人事关系和具体历史细节的基础上,以回到现场、情景再现的方式,为我们重新描画了“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学场景,并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中从产生背景、编辑发行、文学创作、被迫停刊及被主流文学逐步接纳等几个方面完整再现了《今天》的历史面貌。

由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历史化”,所以,当代文学史对《今天》的评价基本上还停留在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为我们呈现的“结论”上面。《暗夜中的潜行者》通过对《今天》的扎实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我们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认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新时期之初的主流文学批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今天》的部分作家作品,但是,这种接纳也有意无意地对《今天》真正的思想艺术追求淹没了,包括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象思想解放的真诚向往。在进行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时候,如果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就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梁艳的这部著作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文献分析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一项工作。

文学评论不能误导读者

□唐小林

1987年,翻译家叶君健在为《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评论;但没有文学创作,评论自然也就无的放矢了。两者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评论指导向创作或者指导读者的阅读,那也未免言过其实。有的评论恰恰起了反面的作用,妨碍创作,把读者引入歧途,甚至还搅起一场混乱。”20多年过去了,在当代文坛日益浮躁,一些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常勾肩搭背,构成利益共同体的今天,有的文学评论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充当作家作品的“代言人”,误导读者的现象可说是愈演愈烈。

我们知道,在国外,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文学评论家从来就不会轻易去靠近某一个著名作家,与其如胶似漆地黏糊在一起的。他们更加看重的是自己文学评论的学术价值和宝贵的声誉。然而,纵观当今的中国文坛,文学评论家与著名作家形影不离地出现在各种场所,为其作品吹嘘捧场,早已屡见不鲜。

近年来,文学评论家们对某些著名作家的追捧,其表达方式几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他们只要将“巅峰、经典、超越、突破、新高度、史诗、百科全书、

震惊、震撼、吃惊”这样一类大而无当的词语挂在嘴上,任何一个人人都可以把一部稀松平常的平庸之作吹捧成不亚于马尔克斯、福克纳、米兰·昆德拉和格拉斯等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遗憾的是,在一些评论家禁不起世俗诱惑的今天,“红包批评”和哥儿们气式的情友情吹捧,越来越使文学批评遭遇诟病,让评论家们名誉扫地,颜面丧尽。在这样一股世俗风气的熏染之下,一些评论家已经逐渐蜕变成了某些著名作家的托儿,无论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写得有多差,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将其作品吹捧得天花乱坠。诚如作家残雪一针见血所指出:“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不是像现在这样违背良心地胡说一气,他们早就应当指出文学的水平下降不成样子了。”

文学评论家并不是作家的产品推销员,只需帮助作家将作品推销给读者。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至少应该懂得对文学的尊重和做人的尊严,而绝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甘堕落地成为某些著名作家的吹鼓手。在繁荣文学的今天,我们更加渴盼中国的文坛上,能够有像别林斯基和勃兰兑斯这样伟大的文学批评家的产生。